

五代人守护一座楼

浙江南浔嘉业堂藏书楼的故事

董国宾

我爱村落，也爱炊烟。乡亲们从田间劳作归来，在家里生火煮饭时，一道道炊烟便呼应着升上天际。每当看到它们像云一样迷人的身影，我的心里就充满无限快乐。

我们的村子不大，200口人，几十间屋舍，这巴掌大的地方却有着数不清的快乐和童趣。10岁的我在房前屋后转悠，在一个固定的时刻，蓝莹莹的炊烟会弥漫在头顶上。村子里有多少户人家，就有多少个烟囱，每个烟囱都大呼小叫地冒炊烟。

我是个小孩子，有事没事就跑到村西头的土堆上看炊烟，阳光下的炊烟像一条闪光的蓝带，不紧不慢地腾上云霄，它们自由自在的样子很迷人。望着眼前的炊烟，我会陶醉上大半天。

炊烟是村里人家生活的一部分，和大大小小的事物没什么两样。在这个小村子里，我听过长长的牛叫声，常常见到花斑鸡在墙根啄食，还看槐花开了又一树一树，那些快乐的柳絮把水塘染了一层白色。最让我开怀的是白杨树的“毛毛虫”，还有那满篱笆的数不清的小花朵。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，很多人都穿着草鞋度年月，最爱穿格子上衣的村妇总有忙不完的事。我爱村落的炊烟，还喜欢这里的一些事儿。在我的生活里，村落是个最好玩的落脚处。

我还没有长大的时候，不能像大人一样做很多事，跑到土堆上看炊烟，就成了我生活里的一片绿叶或者一只花朵。大人在家里劈柴、喂牛、磨米，一生都在同一个地方重复这些事，好多活都干完了，已经完成的事情下一个年头还要再做一遍。我没心思把大人做过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想完，就爬到高处看炊烟的影子，看那些似乎看得见又似乎看不见的东西。我选定晴天丽日看炊烟，这个时候的炊烟心思轻，它们梦一样地东边逛逛，西边瞧瞧，然后飘飘渺渺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若在阴雨连绵的天气里，炊烟就变了样，一团团烟雾挤在一起，灶舍里满了它们不忍离去的身影。半湿半干的灶柴像是费尽力气开了个玩笑，当一缕缕青烟攀上了高空，而帘里就变成不同的景致了。庄稼收获时节，炊烟稀稀落落地在村子上空露一下脸，一转身就走掉了。乡亲们把一顿饭的时间用在收割和劳作上，只简单地撒一点灶茶泼饭饱肚子，炊烟也就没了过年过节时的热烈和浓重。但庄稼收获了，这若有若无的炊烟心里埋藏着的却是说不出的开心和快乐。

我们的村子人口不多，却有说不完的事。西边人家好玩的事多，炊烟忍不住升到半空，风一刮就跑到过去。一道道炊烟像一团团雾，它们并肩向西走，还交叉接着说这些没完没了的话，雾一样的炊烟和这些朝夕相见的事在同一个村落里就成了莫逆。那天，一户人家从田间锄归来，一大晌锄了好几亩地。今天干的农活多，中午做饭的时候冒出的炊烟也就浓，浓滚滚地向空中升去。这一时刻，村落里家家户户房顶上都有青烟冒出，像一排排树，枝枝叶叶都很茂盛，东边的西边地连成一片。这些青烟欢快地往上窜，半空中布满了烟的影子。田家的烟，李家的烟，孙家的烟，都交融在一起。村落里有了一些飘忽的云。炊烟从一家一户的烟囱里升腾出去，哪个路口停着牛车，哪棵树又长出新竹，谁家有多少农具和牲口，炊烟都耳熟能详。谁家娃衣裤破了一个洞，王家镰刀眼看磨钝了，周家屋舍破旧得漏了雨，梁家娶媳妇缺少钱，吴家有些日子没吃上一顿好饭了，村子里讲不完说尽的事，炊烟都保存在记忆里。庄稼人家里的事多，简单的复杂的，东边的西边的，但他们总是若无其事的样子，没谁看到他们大声吵闹过，只是一味地做事情。炊烟也好像天天都有高兴的事，望着得似云影，看不出谁家遇到过麻烦事。灰喜鹊天天在枝头上叫个不停，鸡鸭鹅快活得跟说着说那说那，村子宁静又快乐地过着一天又一天。

快乐的炊烟



上图：藏书楼。

摄影：沈勇强

陆士虎

想象秋天到来的时候，朝霞穿过蔚蓝天朗的天空，把南浔涂抹得一片金碧辉煌。纵横交错的河道，连着郊外金黄的稻田，翠绿的桑园，使人联想驰名中外的辑里湖丝曾经赋予这江南古镇的富裕。农贸市场叫卖鲜活鱼的喧闹，与马路上轿车的喇叭声，合奏出欢快的晨歌。

我踏着平坦的石板路，沿着清清的鸪咕溪走去，便到了嘉业堂藏书楼。踏进嘉业堂门口那小平房，却不见人影，我一直找到后面库房里。突然，一个中等身材的背景映入眼帘——他身着蓝色工作服，正忙着整理印书用的雕版。我轻轻地叫了一声：“郑兴宝。”他回过头来，冲着我笑了。光线昏暗地映亮了他的一半脸，露出了颇为文气的笑容。

郑兴宝曾任浙江省图书馆嘉业堂藏书楼管理部主任，退休已多年了。他在这里默默地度过了三十个春秋。对于这位土生土长的南浔人，我还是挺熟悉的。

郑兴宝是1983年冬天从部队连指导员位置上转业回到故乡南浔镇，等待组织分配工作的。当时浙江省图书馆正通过当地有关部门物色嘉业堂藏书楼新管理员。经过筛选，挑出了包括郑兴宝在内的两名候选人。有一天，省图书馆从副馆长等人专程来到南浔镇，通知郑兴宝到大陆旅馆谈话。这时，他才得知两名候选人都是转业军人，另一位也是连指导员，政治、思想和文化素质都不错。郑兴宝唯一的优势是不抽烟。从副馆长笑容，谈到了藏书楼防火、防潮、防虫工作的重要性，并很严肃地提出警告：“记住！嘉业堂藏书楼决不能发生火灾。否则，你就要吃官司！坐牢！”从此，郑兴宝对火烛之物极其敏感，时刻防患于未然。

嘉业堂藏书楼1992年正式对外开放以前，一直是大门紧闭的。偌大的一个藏书楼只有一人管理。他的名字叫汤福璋，是省图书馆派到南浔的一名普通管理员。老汤从杭州调来，一家四口日守寂寞，与古籍、雕版相伴，并精心保养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为了确保安全，一年365天，日夜不能离开。凡不符合上级规定叫门进来的人，一律不得入内。老汤虽然不是学者，但深知嘉业堂中古籍价值连城，他摆出一副“大革革”的架势，用石灰和黄泥涂了一切见山露水的痕迹，再用红漆在上面大书特书标语口号，使藏书楼成了“红色的海洋”。给他壮胆的还有嘉业堂周围的农民兄弟，让他准备好一洗脸盆和一根桑柴头，只要有紧急情况就登楼击盆为号，农民兄弟就赶来支援。

有一次，一群红卫兵团团围住了嘉业堂。老汤急中生智，开口操杭州官话：“周总理曾指示南下大军保护嘉业堂藏书楼，陈老总也来视察过。”他千方百计把红卫兵阻挡在外面。“冲！冲进去！”红卫兵大声嚷道。老汤挺身而出挡在铁门，冷静地望着了一眼红卫兵，说：“嘉业堂藏书楼是浙江省图书馆的古籍部，里面藏的全部是中国古籍，这些古籍很珍贵，很有价值，你们千万不要乱来。（上个世纪）50年代为了查找中印边界各种珍贵史料，中央让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一些图书馆查找，后来却在南浔嘉业堂藏书楼里找到了好几份哩……”红卫兵听了这些道理，又望望门里的“红海洋”才半信半疑地离开了这座抹着神秘色彩的藏书楼。

现在，老汤早已远行。他从未认自己是“功臣”，但南浔人永远记着他！

凡是爱书的人，都不应该忘记他！

二

人称嘉业堂藏书楼是南浔文化的封面，此话颇含哲理。核心词嘉业，指的文化，意在美好的事业。1920年初冬，南浔俗称“四象”之首富刘镛的长孙刘承干在此大兴土木，花了四年时间建造了这座中国近代时间最晚、藏书最多、结局最圆满的著名文化宝库，累计集书60万卷。他的收藏不仅典籍宏富，而且精英秘笈，世间不经见的书插画森森。宋槧元刻、稿抄本及地方志的大量收藏，可以说是其三大特色。据华东师大周子美教授《曾见嘉业堂藏书楼编目部主任十年》生前回忆，刘承干曾给他算过一笔账：建造书楼12万，购书30多万，刻印书20多万，聘人编、校、抄、鉴定等10万，总计80多万。半个世纪之后，刘承干的一个孙女留学德国，看到慕尼黑图书馆里藏有线装书，就问：有没有中国嘉业堂藏书楼刊刻的古书？工作人员说：没有！因为嘉业堂藏书楼的刻印本太贵，不是按册计价，而是按页计算的。可见其影响已远非那个“80多万”了。周子美由此认定它是“中国近代史上私家藏书最多、花费精力、金钱最多的一个。”

书楼始成之日，刘承干为此记文，诫其子孙不得损毁失散。他对古籍虽很有研究，却不善于经商。由于后来家道中落，日本军队的入侵，藏书楼也难逃衰落之命运。

也有人说，抗战时期刘承干深知日本人收藏书籍的习惯——好全部而恶残本，就将大批珍本善本抢救运沪，而从无法运走的整部书籍中抽走了第一册（另一说是首尾两册），密藏在他南浔的别墅天花板上，以免被日本兵掠夺。解放后，刘承干将这些隐藏之书“完璧归赵”。于是就有了嘉业堂藏书楼“覆篋”下仍有完卵的奇迹。1951年11月19日，刘承干把藏书楼捐献给浙江图书馆。这一举措与他当年聚书时“保存国粹，匹夫有责”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。

屈指算来，郑兴宝已经是嘉业堂藏书楼第四代守护人了。接任一年后，正值全省古籍整理培训班在南浔举办。他一头钻进培训班里，以军人攻克堡垒的拼劲与毅力刻苦学习。培训班结束后，又继续努力，在较短时间内初步掌握了古籍的管理知识。

为了藏书楼的安全，这里的电源只接到大门口的平房为止。偌大的一个藏书楼里不接电线，不装电表，没有任何电器设备。当时南浔镇上居民住宅比较紧张，郑兴宝由于没有住房，一家三口就一直挤在大门口的那小平房里。这小平房原来是灶间，仅有23平方米，此时改为值班室兼办公室，又是他的寝室。每天夜里，他都要起床好几次，打着手电筒在藏书楼巡查。即使三九严寒，大雪飘飘，也不例外。每当风狂雨骤、雷鸣电闪的黑夜，“杯弓蛇影”，阴森古怪。但越是这样的黑夜，他越发频繁出来，生怕哪扇窗户破损了，哪片砖瓦刮掉了，哪本书受潮了。

三

三十年过去了，弹指一挥间。嘉业堂藏书楼历经岁月的风风雨雨，却依然安然无恙。似乎跟以前没有什么两样。不过，郑兴宝心里却一清二楚：由于十年浩劫的影响，嘉业堂曾一度年久失修，庭院内杂草丛生，荒芜不堪。有一次，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谢铁骕来此参观，走进藏书之地，一眼看见桌上厚厚一层蝙蝠粪便，连声道：“犯罪，犯罪。这是对子孙后代不负责任。”当场表示要向领导如实反映。不久，中共浙江省委领导亲自视察了一次藏书楼。另有几次，《人民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等报社记者实地踏访后，对嘉业堂的情况，也作了书面反映，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。于是，1984年至1986年由省文物局专项拨款25万元，维修了书楼、花园和河驳岸；1991年至1992年，又专项拨款20万元，增建了存放雕版的库房。同时，加强了书籍修理和管理力度，使藏书楼完好如初。

嘉业堂藏书楼从1992年正式对外开放以后，已集图书馆、文物部门、旅游景点于一体，成为南浔古镇最靓丽的名片之一。郑兴宝在书楼里的工作频率比以前更快了。他每天的老习惯，就是进了门口那个小平房，先穿上工作服，然后上楼去打扫卫生，开窗通风。每逢“霉季”过后一段时间，他每天早晨都要打开四面窗户通风，迎着冉冉东升的朝阳；午后关掉西窗开放东窗，让西斜的夕阳照射进来，保持室内空气通畅。他从早到晚随时注意天空的行云变幻，以防阵雨狂风

袭击。以前还在一排排书架和每一叠书籍行间放樟脑丸，用连四纸裹好，四颗一包，以防虫蛀；现在回归传统的方法，改用芸香草替代。灰尘可以清除，蛀虫也能防止，但心灵的浮躁却难于根治。嘉业堂的优雅与委婉，常常引得一些暴发户试图搭台唱戏，搞什么时装模特表演、展览等所谓的文化交流活动。郑兴宝听了总是摇头笑笑。他笑这些人的痴心妄想绝不可能在藏书楼实现。

如今，郑兴宝眼角的鱼尾皱纹已不知不觉加深了。但他甘居寂寞、长守数十年儒商的长筒纪实文学《江南豪门》时，也得到了郑兴宝的很多帮助。这部30万字的新作已于2008年1月由文汇出版社出版。每当翻阅着散发油墨清香的书页，我的心头总是对郑兴宝充满了感激。

四

郑兴宝退休前，物色嘉业堂下一代守书人的时候，南浔镇有关部门推荐了几个人，但浙江省图书馆领导看了这些档案，都退了回来。那么，到底谁比较适合到这寂寞而又清贫的藏书楼来工作呢？

郑兴宝大胆提出了自己的独生儿子郑宗南。在郑兴宝的眼里，没有哪一个年轻人比自己的儿子更熟谙这里的一草一木了。从牙牙学语的幼童到佩戴红领巾的小学生，从青涩少年到朝气蓬勃的小伙子，郑宗南已潜移默化成了藏书楼的编外一员。

郑宗南当时正在读大二。有一天接到妈妈的电话，为此事征求意见。郑宗南没有马上回答。他心里感到很矛盾，犹豫不决。他想，父亲要自己回到南浔藏书楼接班也是一件好事，但考虑到自己已经跑到城市去了，毕业后还回南浔去干什么。

也许是天生有缘吧。由于业余爱好的关系，郑宗南常喜欢跑到南浔百间楼文化老人沈嘉庆先生家去练字、习画。那年暑假的一天，他与沈先生无意中谈起毕业后的去向问题。沈先生一说起讲述了参与南浔古镇保护修复的故事。沈先生说，张石铭旧居刚开始修葺时，曾接待了菲士蒙、凯丽夫妇等一批法国朋友。没想到他们看了整整半天，甚至掏出手帕擦掉法国地砖上的灰尘仔细端详，惊奇地感叹：“啊，我们在这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！”“这房子本身就是一部建筑艺术史！”一个月后，法国的菲士蒙、凯丽夫妇来信说，经考证，张石铭旧居中的玻璃雕（蓝晶刻花玻璃）是18世纪法国的贵重工艺品，现在法国博物馆里还有陈列品呢……听此，郑宗南与沈先生一样怦然心动，仿佛拨开岁月的迷雾，看到了南浔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和内涵，也看到了古镇保护的价值和意义。他想，这种对南浔文化遗存的热爱，父亲郑兴宝、沈嘉庆先生等一批批南浔人有，郑宗南也应该有！

两年后，浙江图书馆经过研究，同意了郑兴宝举贤不避亲，让他的儿子接班守护嘉业堂。2004年，郑宗南上班后，郑兴宝却暗暗担心：“父子俩在一块儿工作也许未必好。我不太好说儿子什么，说了他不听怎么办？都是同事嘛！”所以，郑兴

宝给省图书馆领导写了一封信，请求批准儿子去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小组培训，请老同志“传帮带”一下。

郑宗南从杭州培训结束后回来，又参加了南浔有关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（嘉业堂、小莲庄、张氏建筑群）文物“四有”档案整理。四个月后，他开始了古籍修补工作。这也是父亲还来不及做完的工作。

还是这座寂静的藏书楼；还是这张老式的办公桌。

郑宗南跟着父亲边学边干，几乎形影不离。古籍修补初看似乎并不复杂，但实践起来却并不容易，第一要弄清什么钥匙开什么书库的门；什么书放在什么地方；第二对不全或残缺的古籍要细致地穿线换面、补修书页……就这样，郑宗南花了一年时间才初步掌握了这门技术。同时，也完成了父亲来不及修补的200余册古籍。

2009年1月，郑兴宝光荣退休了。浙江省图书馆党委书记应长兴兼任了嘉业堂藏书楼管理部主任，每月定期或不定期来南浔检查、布置工作。而具体工作则由郑宗南负责。2011年，郑宗南接任了嘉业堂藏书楼管理部主任职务。而郑兴宝仍在那里发挥“余热”。因为从2008年下半年起，他们开始了雕版的建档工作，即用宣纸、玉扣纸把雕版上的文字印成书页，装订成册。此项工作计划八至十年完成。正因为这个�项目，才招收了郑兴宝在內的六位临时工。

我去采访郑宗南的时候，他正在书楼上埋头修补古籍。桌上堆满线装古书，四周都是书橱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，与外面喧嚣的环境判若两个世界。或许郑宗南是传承了父亲的基因，为人也很憨厚、低调。我很想从他身上寻找些闪闪发光、感人肺腑的事迹，但他总是以前那几句话：“没有什么。”“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光彩。”“这都是一些很平凡的工作，但都很有意思！”

郑宗南的话不多，却在我心里引起波澜。现在有人说，一张光盘可以存入一座巨大的藏书楼，藏书楼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潜台词似乎是，不光藏书楼没有必要存在，别的许多东西都可以不必存在了。其实面对文化信息密集的网络挑战，传统藏书楼的重要意义已经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范畴，而将作为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和标志存在着，体现了炎黄子孙对于文化的保护是何等的悲怆和神圣！

太阳已经落山，神秘的夜幕开始降临。嘉业堂藏书楼内万籁俱寂，唯有大门口那小平房的窗口灯光闪烁……此刻，郑宗南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，柔和的灯光勾勒出他壮实的侧影。这位年轻人怀着美好的梦想，学习、工作都很刻苦，他的灯每天都会亮到更深夜静，但他总觉得是第二名，父亲还是自己最好的老师和顾问。他仿佛躺在了无声的古籍书册之上，像当年的父亲一样，默默地守护着这中国近代传统书楼的绝唱，守望者这江南古镇南浔的文化之根！

两年后，浙江图书馆经过研究，同意了郑兴宝举贤不避亲，让他的儿子接班守护嘉业堂。2004年，郑宗南上班后，郑兴宝却暗暗担心：“父子俩在一块儿工作也许未必好。我不太好说儿子什么，说了他不听怎么办？都是同事嘛！”所以，郑兴